

文史资料选编

Wenshi Ziliao Xuanbian

第二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09,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

书号：11071·408

定价：1.80元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九辑 目 录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 何柱国 (1)
- 父亲刘桂五烈士在西安事变前后 刘清芳 (58)
- 张学良与赵媿小姐二三事 陈大章 (64)
- 张学良先生义演救震灾 孙焕彩 (68)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杂忆 周锡卿 (70)
- 倪征燠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片断
..... 东方亮 (80)
- 驾机起义前后 李学晃 (88)
- 策反“陆大”起义的经过 陈济生 (100)
- 范文澜同志在狱中 郑 文 (107)
- 焦菊隐先生在师大 徐 康 (117)
- 忆先父司徒美堂 司徒柱 (132)
- 解放前夕的北平文化界 徐 盈 (139)
- 溥仪特赦前后 金蕊秀 (146)
- 清代太医院考 赵绍琴 (156)

记清季派遣幼童出洋 谢兴尧 (164)

伪满皇帝的掌印机关——“尚书府” ... 沈信夫 (176)

中国旅行社与早期的北京旅游 徐芳田 (180)

静宜园与香山慈幼院 禹金孝 (189)

北京西郊温泉 常 华 (227)

白云观杂记 胡海牙 (240)

几经沧桑的东单大地 刘恩禄 (247)

驰名京沪的中国照相馆 姚经才 何黄生 (263)

阜顺喜轿铺 王永斌 (275)

特 稿 谈谈文史资料工作 荣孟源遗稿 (280)



李苦禅等四人没有同住

一个公寓 李慧文 (297)

全素斋建于一九〇四年

..... 刘文治 (298)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

何柱国口述 施文洪整理



〔作者简介〕

何柱国，广西容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教官、分队长，一九二二年，投奔张作霖，先后任东北讲武堂教官、东北军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于敌手，何

西安事变前后的何柱国
柱国将军率部在山海关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重创入侵之敌，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一九三六年，何柱国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甘肃固原、海原一带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和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让开道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何柱国将军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

在张学良将军被羁以后，追随杨虎城将军，不避艰险，折冲尊俎，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原国民党骑兵军军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在晋西北、陕甘宁、豫东皖北等地与贺龙、彭雪枫等同志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并两次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热情接待。抗战胜利后，何柱国将军因双目失明，长期在杭州养病。建国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因病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下野出国

热河失守后，华北危在旦夕，全国人民无比愤慨。国民党南京政府又把失地的责任推到主持北平军分会的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

张学良辞职电发出后，蒋介石从南昌电约张到保定会晤。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夜，张学良偕同顾问端纳，以及汤国桢、王卓然等乘专车前往保定。张学良本以为蒋介石会来慰留他，因此还想请求调集全部东北军，补充弹药后反攻热河，收复失地。他们到保定后，蒋介石的专车还没有到达，宋子文已先到了。他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说：“失东北、丢热河，委员长与副司令都是责无旁贷的。现在全国舆论纷纷谴责你们两人，因此你们两人中，必须先有一人下野，才能平息民愤。”这时张学良才醒悟过来，原

来蒋介石约他会晤，是要他下台。他便答复宋子文说：“既然如此，那就请委员长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于是宋子文立即将张学良的原话电告蒋介石。午后，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张学良与宋子文立即登车和蒋介石见面。不等张学良开口，蒋介石便说道：“我接到你辞职的电报，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纷起诘责，对我们两人都不谅解。我们两人比如风雨同舟，命运与共，必须有一人先下水，来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情绪，否则将同遭没顶。所以我决定你先辞职，待机再起。子文转达了你已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张学良当即率直地回答说：“我不战而失东北，早就应该引咎辞职。今又丢失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先下水，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申国法，而振人心！……不过，日本早已野心勃勃，妄想吞并我全中国，希望中央迅速调派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

蒋介石说了几个“好，好，好”，便和宋子文下车去了。过了一会儿，蒋介石亲到张学良的专车上回访了一下，便登上他的专车走了。

张学良返回北平后，即对公私作了安排。经过榆关和热河战役，东北军剩下二十六万人。他将部队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四人分别统率。临行之前，他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讲了一次话。他说：“我要到国外去走一趟，不久就会回来。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丢下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以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

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元帅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老百姓。中央给我们河北省这块地盘，交给孝侯（于学忠）负责。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乡亲很多，都已无家可归，要照顾好这些人。多给孝侯一些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顶住日本人的进攻，保牢河北省这块地盘。”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张学良携带家眷和随从，由上海乘意大利“罗西伯爵”号轮船，出国考察。

回 国 之 后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占我国，局势一天比一天险恶的时候，蒋介石仍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方针，在武汉成立了“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全力“剿共”。为了利用东北军“剿共”，一九三三年年底，他电召张学良回国。张学良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回国。二月七日蒋介石任命他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的副司令。三月一日张在武汉就职，并带东北军到鄂豫皖一带，参加了对红军的“围剿”。

事先，蒋介石批准了原“剿总”参谋长钱大钧出国。张学良打算报请蒋介石派我继任参谋长。他来征求我意见时，我说：“我不适宜担任这个职务，因为钱大钧是蒋多年的亲信，由他当参谋长，可以上下通气，事情好办，蒋也放心。我和钱大钧先后是黄埔陆军小学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关系比较密切，有什么难办的事，还可找他从中斡旋。因此我认为还是挽留钱慕尹（钱大钧号）任参谋长为宜。”张学良同意了我的意见，并派我亲自到南昌，面请蒋介石收回成命，就这样钱大钧蝉联了参谋长之职。

张又和我研究了东北军的调防问题。决定调王以哲的六十七

军驻防豫南；刘多荃的一百零五师调平汉路南段；我的五十七军调鄂豫皖边境地区。我率军部驻防宋埠。所属一百零九师由我兼任师长，一百一十五师姚东藩部，一百二十师常经武部，分布在孝感、黄陂、潢川、麻城、黄安（现名红安）等地，对大别山区的红军徐海东部进行“围剿”。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又要吞并华北五省（绥、察、冀、鲁、晋），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为什么张学良回国后不去抗日，却跟随蒋介石“剿共”呢？这主要是由于他相信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那时，蒋介石不遗余力地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剿共”的政策。记得一九三四年七月间，我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时（蒋介石兼任训练团团长，陈诚为副团长，团附为孙连仲），每次“总理纪念周”上，蒋介石都亲来训话，除讲“总理遗教”外，就极力鼓吹“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当然是蒋介石了。特别提示我们“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服从领袖，最为重要。”并再三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一能取胜于外者”，“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对蒋介石的这些话，张学良认为有一定道理，所以才接受了“反共剿共”的任务。

张学良在国外这段期间，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很深。这是他接受“剿共”任务的又一个原因。回国后他经常到我们驻地巡视。在交谈中，他时常流露出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崇拜。他曾说：“中国的政治要安定，就非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国家的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也只有此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线：一为法西斯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可惜我不能到苏联去

游历一下，就我所知，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行。我们是次殖民地状态的国家，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一条路，模仿德、意，才能迅速复兴中国。”张学良在意大利住了几个月，和墨索里尼的女婿、前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和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齐亚诺过从甚密。他十分醉心于德、意的法西斯独裁政治。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写道：“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上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拥护领袖。”张学良曾和蒋介石谈到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独裁体制，建议蒋介石也建立一个法西斯政党。对张学良的建议，蒋介石虽然口头上不同意，但心里却是赞赏的。这时，他摸清了张学良的思想动向，还看到了东北军尚有实力可资利用。为了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一箭双雕的目的，他便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边区“剿总”副司令，昇以兵权，把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一带来“剿共”。

东北军的官兵们听说张学良归国，十分欢欣。大家满以为张学良能重新统帅三军，收复失地，重返家乡，没想到却被南调来“剿共”。北兵南来，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又携带家眷，长期过着流亡生活，到处受到歧视，因而思想混乱，情绪不安。经过与红军几次交锋，我们感到，和红军作战没法打：我们习惯于打正规战，红军却没有防区，没有阵地，来去无常，行动飘忽。他们以动制静，打了就跑，对这种游击战术，我们穷于应付。有时我们一个连、一个营地被红军吃掉了，俘去的官兵，经过教育，又被放回来。这样一来，我们的士气就无形中被瓦解了。红军打仗，取粮于敌或就地补给，老百姓却欢迎他们，

军民一家，情报灵通。我们是自带给养，而老百姓只要听到“妈拉巴子”的东北口音，就相率逃避，有时连个向导也找不到。红军所到之处，如鱼得水，行动自如；而我们东北军每到一个地方，如涸辙之鲋，动也动弹不得。因此我们和红军打仗，总是吃亏，得便宜的时候很少。打来打去，一些官兵对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办法和信心就动摇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蒋介石撤销了“鄂豫皖剿总司令部”，于三月一日，改任张学良为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四月二日，国民党政府晋升张学良为陆军一级上将。这时，蒋介石曾计划把东北军全部调到贵州，任张学良为贵阳绥靖主任。他的用意是想利用东北军来牵制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地方割据势力。张学良为了使东北军有一个休整机会和地盘，准备接受这个方案。

他和我商议时，我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认为自“九·一八”以来，东北军流亡关内各地，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中，不仅备尝艰苦，还受到各方的责难和歧视，其所以仍能团结在“少帅”旗下而不散，就是盼望“少帅”能有一天率领大家收复东北，回返家乡。如果再调西南，离东北越来越远，军心士气就更难维系了。何况贵州地瘠民贫，气候恶劣，北方人到那里也难以适应。再加上贵州的王家烈，是地方上的割据势力，他绝不会欢迎客军入境，难免发生磨擦不和。现在红军主力北移，王以哲军已跟踪徐海东部向北调动，不如趁此机会要求将东北军调往洛阳以西地区。这样既可以稳住军心，又可以随时作收复东北的准备。张学良采纳了我的建议。经与蒋介石商议，才改变了将东北军调往贵州的计划。

我本来是五十七军军长。在调进陕甘之前，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指示，将东北原有骑兵七个师，连同中央所属三个骑旅，合并为五个师，编为骑兵军。蒋介石与张学良商量骑兵军军长人选时，张学良推荐我，说我是唯一从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出来的。我认为骑兵配合步兵作战是有作用的，而单独成立一个骑兵军作用不大。况且我回国以后，一直带的是步兵。所以我请张另荐他人，张学良一定要我干。他说：“你不干，中央一定另派人，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军，白送一个军给他（指蒋介石）。”这是张对我私下讲的话，我不能不接受，这样我就成了当时唯一的骑兵军长了。后来抗战期间，我的骑兵军进入山西，阎锡山也有个骑兵军（司令赵承绶），和我的番号重了，为了避免混淆不清，将他的改为骑兵第一军，我的改为骑兵第二军，这是后话。

蒋介石这时为什么要建立一个骑兵军呢？他说：“骑兵行动快速灵活，可以更有效地堵截红军；红军无车无马，遭到堵截时必然溃逃，用骑兵一追，就可以消灭。当年左宗棠平息阿古柏之乱，不是使用了马队，才很快得胜的嘛！”这是蒋介石的想法，实际并非如此。

一九三五年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其前锋已到达川北、甘南一带。蒋介石于九月间召集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等在四川开会，妄图彻底消灭中央红军于陕甘地区。他除对西南各路军作了部署以外，还决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派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权，以晏道刚为参谋长，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第三路军，以及青海马步芳的军队和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都归“西北

剿总”节制。这时张学良所能指挥的兵力在三十万以上，与红军对比，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张学良满以为这回可以取得“围剿”的胜利，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从而在西北站住脚跟，扩大东北军的实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东北军陕北三败的震动

六十七军王以哲部，是东北军劲旅之一。人员充足，装备精良，辖有刘翰东的一零七师，吴克仁的一一七师，何立中的一二零师和周福成的一二九师。“西北剿总”成立后，王以哲奉命由陕南山阳、商县一带向陕北进攻。由于陕北红军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方针，他的三个师沿途没有遇到抵抗，得以长驱直入，先后进占了酈县（即今富县）、甘泉和延安。王亲率何立中、周福成两师驻守延安。

九月下旬，王以哲派一个团到甘泉去接运由西安运来的棉服、装备。不料该团一到甘泉城里，就被红十五军团围困得水泄不通。甘泉被围，酈县至延安间的交通中断，王以哲的部队就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王以哲得到情报后，立即南返洛川，并派何立中率领其余几个团去甘泉解围，以确保酈县与延安间的通道。十月初，何立中率部南下，行至三十里铺时，又留下一个团作为戒备，顺利通过山高路隘、林木茂密的九理山险要地带。到了劳山附近，公路夹在起伏地中间，两旁树木丛生，何立中以为险要地带已过，疏于防范，又遭到红军伏击。激战中，参谋长范驭州被击毙，团长裴焕彩被活捉，另一团长杨德新自杀，师长何立中颈部中弹而死。该师的三千七百余人，全部被红十五军团歼灭了。

劳山战役后，一零七师刘翰东的六一九团高福源部，在进驻

郿县至甘泉间的榆林桥，执行筑堡任务时，又遭到了红军奇袭，团长高福源以及全团官兵大都被俘。至此，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全部陷于困境。这是张学良出兵陕甘，受到红军的第一次打击。

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进驻延安以后，“西北剿总”命令他继续向北进攻。临时任命王以哲为第一路军总指挥，我为第二路军总指挥。于是我带领少数参谋、副官、秘书，卫生连和电台，在宜君北的黄陵，设立临时指挥部。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我接到报告说，我部骑七师第二十一团胡竞先部在静宁青石嘴与红军接触，两个连被击溃。红军绕过固原，冲破毛炳文的第八师、胡宗南部、马鸿宾三十五师等军队的封锁线，向陕北吴起镇进军。我部白凤翔指挥骑六师并骑三师的两个团、第三十五师的马培清团，分路尾追。骑三师一部和马团从两翼合击，白凤翔率部正面推进，到达吴起镇附近，在头道川、二道川之间的五里沟地带，遭到红军猛烈伏击，激战终日，骑三师、骑六师都损失很重，伤亡一百余人，损失驮马、战马很多。白凤翔等撤回庆阳之线，骑兵军指挥部移往陇东西峰镇。这是东北军进入陕甘“剿共”后，受到红军的第二次打击。

东北军遭受红军的第三次打击，是直罗镇黑水寺之战。红军突破西兰公路的封锁到达陕北时，张学良命令董英斌部向陇东庆阳、合水前进。我调任骑兵军军长时，五十七军军长由董英斌代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该部全部到达合水防地。这时张学良要和我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怕前方部队再遭红军打击，便命令王以哲和董英斌两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部队停止前进，就地集结整训，不得随意向红军作战。他还亲自驾飞机带着我到甘肃庆阳。当时，他不能向董说明

不能和红军作战的原因，只能当面告诫董英斌说：“你这一路的‘剿共’任务，过去虽然规定过，但现在形势有变化，要暂缓前进。部队何时行动，须听我的命令。”

张学良离开西安后，“西北剿总”的日常工作，由参谋长晏道刚负责处理，但张没有把他给前方部队停止行动的命令告诉晏道刚。张在南京开会期间，六十七军王以哲所部仍被困在甘泉。为解甘泉之围，“总部”参谋长晏道刚没有通过张学良，就命令董英斌部东进。董英斌接到命令后，在一零九师驻地太白镇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既无作战经验，又狂妄自大的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自告奋勇，要带兵沿路途较近的北路，经黑水寺、直罗镇、张村驿（均为红区，而且路窄而险）等地，向洛川前进。董英斌不是张学良的嫡系，对几个师长缺乏驾驭能力。虽然他认为牛的意见不妥，但牛元峰是张学良的亲信，故俯就了牛的意见，又拨了一一师的于一凡团配属一零九师作战。

五十七军进驻黑水寺后，董英斌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约定一零九师占领直罗镇后，牛元峰须回军部，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一零九师从黑水寺出发后，十一月二十日拂晓，遇有红军阻击。一零九师战斗前进，红军且战且退，诱敌深入。牛元峰以为红军败退，就在当天下午占领了直罗镇。牛元峰忘记了黑水寺会议上的约定，自以为险地已过，可以安心在直罗镇过夜。便把配属给他的于一凡团归还原建制。不料，第二天拂晓，直罗镇南北两面山上，突然枪声大作，红军南北夹击，把一零九师全部人马团团围住。激战不到两个小时，红军就占领了直罗镇。在这次战役中，一零九师除被俘释放一部分外，几乎全军覆没，师长牛元

峰自杀。增援的一零六师沈克的一个团，也在黑水寺被歼。

当一零九师牛元峰部在直罗镇中伏全军覆没的消息，由“剿总”急电报告给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张学良时，张又急又气。气的是董英斌违背他临行时的嘱咐，晏道刚又擅自作主，致使部队轻率前进，惨遭覆灭；急的是他又损失了一个师。前者一一零师在劳山被歼后，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撤销了番号，减少了军费。这次，张学良向蒋介石报告牛元峰师失败的情况，要求政府优抚何立中、牛元峰两师长及在“剿共”中死亡的东北军家属时，蒋介石、何应钦不加理睬，拒不给予优抚。张愤怒地说：“我的名望已降低至不到二十万元了！”

大会结束后，张学良偕赵媿和我登机返陕。匆忙中连气象情况都没问清楚，就自南京起飞。这天雾大云密，飞机在云雾中盲目飞行。当时，飞机还没有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估计，到达河南平原时，飞机便猛降低飞，离地面只有二百米，才找到平汉铁路。过孟津、河曲一带时，山高雾浓，河谷狭窄，飞机差点撞在一座山上。幸亏机师技术熟练，急忙将机身向上一翻，才免于难。随后又是倾盆大雨，飞机在洛阳被迫降落。第二天，我们只得改乘火车，返回西安。

张学良回西安后，申斥了参谋长晏道刚和军长董英斌，责令其妥善处理一零九师善后事宜。

几千名在“剿共”中死亡和被俘的官兵家属，听说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扶老携幼来到南院门“剿总”门前，呼天唤地，痛哭失声。张学良看到这种惨象，捶胸顿足地说：“我真对不起他们！我把多年的袍泽带到西北来送死，为的是啥呀！”他拿出自己的私款几十万元，在西安和甘肃平凉城外，建筑两个东北新

村，来安置死亡和被俘的官兵家属。

东北军在“剿共”中一连串的失败，给张学良思想上的震动很大。他深深感到：如果继续进攻红军，东北军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而东北军的这点实力不存在了，“抗日复土，打回老家去”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再说红军的战斗力那么强，如果和他们联合起来打日本，该有多好，何必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呢！从此，张学良由积极“剿共”，变为“消极应付”了。

有一次，他自己驾着飞机，约我去巡视陕甘宁前线。我们从飞机上俯瞰秦、汉、唐以来的一些帝王陵墓。他感慨地对我说，人贵有建树，以垂史册，否则就像这些无所作为的帝王一样，死后不过是黄土一抔！又说：关于抗日与“剿共”的问题，过去我认为非先统一，就不能抗日；现在我认为内战不停，就无法造成抗日的局势！提到东北军的前途时，他说，再这样下去（指“剿共”），不仅收复东北无望，就连我手中唯一的本钱（指东北军），也将被打垮、拖垮。要抵抗日本就要保存实力，否则玉石俱焚，贻笑后世了！后来他又指示我们说：“你们要尽量避免与红军决战。但是遇到红军，枪是要响的；枪不响，‘中央’不答应！”

准备联共抗日

张学良清楚地看到，“剿共”是一条死路。为摆脱困境，寻出路，他借出席国民党五中全会之机，去上海秘密会晤了同乡好友杜重远。杜重远直率地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一套做法，建议他联合陕北的红军、陕西的杨虎城部和新疆的盛世才部共同抗日。并向他说明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解除了他心中的疑虑。在上海期间，张学良还和宋庆龄、沈钧儒、李杜等爱国进步人士接触。